

客观看媒体自律与新闻监督

□魏英杰

新闻从业人员道德沦丧有害于新闻监督职责的履行,但不能说,有人违反职业操守,就该废掉新闻媒体行使监督的职责。所以,呼吁加强媒体自律,目的应在于提高新闻监督水平,而不是相反。

连日来,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被长沙警方刑拘一案,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与此案相关的舆论反应,也随着案情变化而跌宕起伏,颇为罕见。

到目前为止,此案事实仍不完全明朗。哪怕是陈永洲本人上央视“现身说法”,也只是嫌疑人的供述,尚未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完整证据链。因此,针对案件本身的议论,难免陷入拼凑案情或预设立场的误区。于众说纷纭中,值得引起关注的,不仅是对新闻职业道德的思考,也有些人基于目前披露的信息,对媒体从业人员大加贬斥,乃至否认新闻舆论监督的价值。

这一状况令人深感担忧。以个人否定全体,以个案抹杀真实,这是显而易见的观念性错误,本不值得一驳。但在当前语境下,实有必要重申常识,厘清正谬。

这里想要重申的常识是,无论陈永洲案今后走向如何,都只是一起个案。这起案件,不是妖魔化新闻监督功能的理由。哪怕最终法律认定陈永洲乃至他所供职的单位有问题,这首先涉及新闻道德,而与新闻监督是两码事。就算涉案人员构成违法,受到司法审判与法律惩罚,这也不能推导出新闻监督功能丧失的结论。

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非常重要,这既涉及个人操行,也关系到所在单位乃至整个新闻行业的形象。因此,对于职业道德与行业规范,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但要认识到,新闻道德是一种行业自律,舆论监督是新闻单位的天职,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可以说,新闻从业人员道德沦丧有害于新闻监督职责的履行,理应谴责,但不能说,有人违反职业操守,就该废掉新闻

媒体行使监督的职责。

事实上,每年报章上都会出现“年度十大假新闻”的评选消息,个别媒体人员因不守职业道德或涉及违法犯罪而受到处理、惩罚,也是时有所闻。这对每一行业来讲,都是正常现象,同时也是难以避免的现象。倘若把个案无限放大,无论哪个行业恐怕都会被人指为“贵圈真乱”。所以,呼吁加强媒体自律,目的应在于提高新闻监督水平,而不是相反。

有人打过一个形象比喻:一旦媒体没有了监督权,社会就像一辆夜间行驶的车辆,而车灯则被蒙上。新闻监督职责的重要性,于此可见。新闻队伍里出现害群之马,当然应该谴责,但这并不是抹黑新闻媒体的理由,更不该是抹杀新闻监督职责的理据。

对于陈永洲一案,有必要冷静对待事件本身,还要客观看待媒体自律与新闻监督之间关系。这样才不会被一时的表象牵着鼻子走。

坚守常识,才能处变不惊,守住底线。

画里有话



张国亮/图

相亲骗局

□奚旭初

去年以来,闹得沸沸扬扬的富豪相亲海选,实际上不过是一家非法组织了牟利而开展的闹剧,该活动并没有所谓身价过亿的100位单身富豪,签订合同的男性会员只有6位,大多是中小规模的民营企业家,而那些梦想嫁入豪门的相亲女性成了该组织精心设计的一个诱饵以及供人把玩的工具。不是为了富豪找美女,而是有人利用美女“钓”富豪。(《信息时报》10月26日)

富豪是假的,相亲是假的,都是子虚乌有,不过是这家机构为了赚钱而策划的骗局,但是也有真的。比如海选现场一幕幕入围竞争就是真的,第一关是整形专家,专门查验美女们是否经过整容;第二关面相大师,把关是否有旺夫相,甚至还用上了测谎仪。美女们一圈走下来,包括身材三围、情感

经历等个人隐私统统暴露。

当那些梦想着嫁入豪门的女孩子在所谓专家、大师面前放下尊严、尽力表现自己、任人品评,待价而沽的时候,她们并不知道自己只是别人为了赚钱而精心设计的一个诱饵以及供人把玩的道具。一场场富豪海选相亲闹剧在愚弄了那些追逐财富梦想女性的同时,也践踏了公序良俗。

骗子当然可恶可恨,但那些女子也有咎由自取之嫌。骗子其实是颇有一点眼力的,看清了一些女子方寸之间,藏着拜金二字,于是专门以富豪作饵,对拜金下钩。财迷了心窍,脑子、眼神就不会好使,上当受骗也就在所难免,这正是假富豪相亲后面的真背景。想“嫁得好”不是坏事。但倘若不问人品,只要有钱就行,谁有钱谁嫁,即使不是陷阱,也成了“爱情的坟墓”。揭露骗局,不是难事——现在这个婚介机构不是被曝光了么?但是要彻底铲除骗子赖以行骗的背景,恐怕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微言大义

◎连海平:取消大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对规范行政行为、建设廉洁政府亦有重大意义。政府部门由纳税人的钱供养,旨在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而大量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使得一些行政部门成了“商人”。以经济利益作为公共服务部门的价值导向,必然降低公共服务质量,甚至产生异化现象。一方面,不可避免导致搭车收费、乱收费,大量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加重了公众的负担;另一方面,行政部门“小金库”的存在,又助长了奢靡之风,加速了官员腐败。

◎郭元鹏:有的岗位报考比例是1000:1,有的岗位却无人问津。这样的现象在就业压力巨大的现实面前显得有点尴尬。而我们更应该追问这样一个问题:除了报考条件等因素限制外,报考岗位缘何会出现“冰火两重天”的现象?答案很简单:

某些岗位与另一些岗位之间,收入差距大、权力差距大、机会差距大。报考人员挑肥拣瘦,再次证明我们岗位有肥瘦之分,有贵贱之分。公考“挑肥拣瘦”源于岗位成了“五花肉”,有的地方很肥,有的地方很瘦。

◎熊丙奇:北京高考新方案公布,英语降低分值,引起各界广泛关注。总体而言,舆论普遍赞成降低高考英语权重。可是,再进一步分析各年龄段群体的意见,就会发现,对于这一改革,公众的情绪还是很纠结。总体看来,这一调查得出一个结果:年龄越大者,越支持降低英语分值、增加语文分值。更为有意思的是,数据同时还显示,最赞成英语降低分值者,也对这能否减轻学生的负担,并不看好。如果再考虑到其他群体的态度,此次降低英语分值的高考改革,能有怎样的减负效果,还有待观察。

◎知遇:但凡考试越早龄化的,题目难度就会在竞争中自动增大,相反,越把考试年龄推后的,越不重视分数的,题目就没有竞争的需要,教育空间和弹性就会越大,学生个人的发育就会更加充分而不是被催化出来的。

中国每个领域的课程专家很容易从自己的经历出发,从西方比中国发达的现实出发,希望中国孩子学习更高深的东西,早早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因此学生从小就学得一大堆原理定律。可是,早开的花未必比晚成的大树更有价值。中国的孩子往往在高考之后,就把前12年的数理化统统忘记。这足以说明,教育产品的内在价值,大多并未内化成孩子的成长价值。当然,这也不是专家和教材思路的问题,而是某些人一直把教育当产业化生产的必然结果。

百姓说话

高考英语改革合民情顺民意

□李世远

据媒体报道,新一轮高考改革的方向基本确定,万众期待的高考改革方案不久将会面世。而各地高考改革剑指英语,尽管众说纷纭,但高考英语改革已成定局。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必将产生深远影响。但改革并非否认英语教学及其重要性,只是根据当前的国情、世情而作出的一种调整性的措施,让遇冷的汉语母语和持续了二三十年的英语热都回归本位。

高考英语究竟如何改革?主要方向大概有三:一、不再考英语,英语考试将在江苏退出高考舞台;二、保留英语考试且分值不变,调整考试题型,山东将取消英语听力测试;三、降低英语分值,北京将自2015年英语考试总分由150分调低至100分。

为什么各地高考改革都将英语作为重点?有人认为,英语只是一种交流工具,学会后受益匪浅;但难度大,耗时多,提高很不容易;许多学生学英语就是为了高考,但不少人因为英语难过

关而耽误一生;许许多多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用到英语,因而没有必要全民下大力气学习。让那些出国深造或对英语有兴趣的人,学有所得学有所成也就够了。因此,降低高考英语分值或取消高考英语听力测试都是非常合理的。

也有人认为,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的热播,点燃了国人对母语“久违”的热情。许多人提笔忘字、书写能力退化,引起人们对汉语教育的反思。汉语“低落”,而“英语热”却持久不衰,很不正常。据调查显示:65%以上的大学生将超过四分之一的时间用在了外语的学习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他学科的学习。再者,近些年全球的“汉语热”不断升温,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世界有109个国家,3000多所高等学校开设了汉语课程,国人对母语所表现出的冷漠与之极不相称。通过高考英语改革,平衡持续的英语热和汉语冷,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至上世纪七十年代,英语还属新鲜学科,在高考中也只是点缀。1977年恢复高考,英语考试比重仅占10%;1983年,英语才100%计入考试成绩……1992

年,英语从一个必考科目升为高考三大主课之一。在这三十多年时间里,学习英语成了影响学生命运前途的重要因素。目前英语高端人才尽管还缺乏,但作为一般实用性人才已经有了雄厚的积累,及时改革,顺理成章。

高考英语改革,有助于改变当前重视英语教学,忽视母语教学的现状,与全球的“汉语热”是相适应的。高考英语改革,可打破传统的应试教育模式,给学生更多自由选择。学生对学英语的需求是在不断增加的,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出国深造,这样更可激发他们学英语的兴趣和积极性。因而,不用担心学生会放松英语学习,英语教学质量也不会降低。高考英语改革,并非否定英语的重要性。全球有近4亿人以英语为母语,有约8亿人把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或第二语言。全世界50%至60%的报刊杂志用英语出版;60%以上的广播节目是用英语播送;70%以上的邮件用英语书写或用英语写信封地址;85%的科技资料用英语发表。我们深知,认识世界,了解世界,与国际接轨,离不开英语,高考英语改革对此不会造成影响。

网言个论

医生频遇暴力,祸起“有罪推定”

□周云

据媒体报道,日前浙江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发生一起患者刺伤医生案件,3名医生在门诊为病人看病时被一男子捅伤,其中耳鼻咽喉科主任医师王某某因抢救无效死亡,另外2人还在抢救中。据初步调查,犯罪嫌疑人连某某,此前为该院患者,对其之前在该院的鼻内镜下鼻腔微创手术结果持有异议。类似的医生被殴打甚至被杀害的恶性事件,近些年来时时有发生。就在前几天,广州广医二院的三名医生遭到死者家属的无理殴打致重伤。而在全国来看,仅2012年,就有7名医护人员在医患纠纷中不幸遇害。

医生和患者关系天然地是一种不平衡的关系。医生掌握有专业知识,这种专业知识上的优势,使得医生相对于患者而言,能够掌握绝对的话语权。但这种绝对的权威性与医疗效果的不确定性又形成强烈的反差。现代医疗技术还不足以百分之百地保证治愈疾病。这样的反差,容易令患者的心理失衡,尤其是在治疗效果与患者心理预期有距离的时候,从而导致矛盾的发生。

但为什么这个矛盾近年来变得如此激烈,动辄就上升为激烈冲突,上升为暴力行为,甚至要以生命为代价呢?在这个问题上,舆论似乎已经习惯指责医生和医院。但矛盾始终是双方的。如果一味地单方面地指责医疗机构,而不去检讨另一个方面的问题,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从医疗机构的角度分析,许多

人相信,医患矛盾日趋尖锐,主要是由现在不合理的医疗体制造成的。而医疗机构和医生,是这个体制的受益者。患者,在很多情况下,则成为利益受损的一方。这是医患矛盾尖锐的主要原因。

我们还应该从患者的角度反思。我们可以指责现在的医疗体制是“有问题的”,但绝不能扩大到任意一个个案中。如果患者对医生持“有罪推定”的心态走进医院,接受治疗,那么纠纷的种子就已经埋下。又或者,出现了医疗纠纷,不管责任在不在医院,患者不分青红皂白地闹一闹,就能得到或多或少补偿,而且还能得到舆论的支持,那么是不是助长了崇尚暴力而不信任规则的风气呢?

温岭和广州的这两起医患冲突性质又更加严重。大多数的医患冲突,作为患者来讲,主要是想要个说法,或者谋求赔偿,总之是想解决问题。但温州和广州的两个案例,患者方似乎没有解决问题的诉求,纯粹是出于泄愤、报复,采用了最野蛮的方式,暴力袭击医生,直至取人性命。虽然这是非典型的医患冲突,但是不是与“典型的”医患冲突中“有罪推定”以及“无理也要闹三分”的心态有关呢?

我们希望正在进行的和将要进行的医疗改革,能最大限度改变患者弱势的地位。但这种改善,是要促使医患双方实现平等的地位。一旦有医患纠纷发生,无论处理机制上,还是舆论上,能够公平地对待医患双方,而不是矫枉过正。否则,医生被打、被杀的惨剧还会大面积发生,这不仅会让医者惨痛彷徨不敢前行,也绝非全社会所有患者之福。